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我们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强调社会公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我们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汕头大学商学院教授 田广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
中国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通过实践、摸索、总结出一些原则,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如今,人们已经在很多方面达成共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既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又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和功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自然,这些有特色的鲜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还需要更为谨慎地再斟酌,增添或删减。特别是观察问题的目光不能单纯地局限于狭隘的经济领域,要站在建立人类社会最先进社会制度的立场上,为国内各民族人民谋求更多的福祉。为此,就

造就技工中产阶层

井水明

在日前召开的第四届世界鞋业论坛上,出席会议的龙永图先生建议,国家应该加快实施让技工富起来的“蓝领战略”,以应对世界性新产业、新技术、新工艺的变革,在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换之中,造就以技工为主体的中产阶层。

近几年,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等发达地区每每遭遇“技工荒”,即便企业出再多的工资也无法招聘到自己想要的技工。蓝领技工在社会经济生活之中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必须重视提高他们的工资性收入,以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而地方政府在善待农民技工的问题上适时推出“蓝领战略”——通过加大技术培训的力度,造就企业急需的技工人才,在提升技工素质和待遇政策的同时,把蓝领技工人才打造成新生的中产阶层,这是在企业的劳动成本上升、社会劳动红利锐减倒逼之下的政策供给——让中国更接近中产社会的技工和高级技工们能够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跨进中产阶层行列,成为推动“中国制造”更上一层楼的现实选择和绕不过去的社会命题。

从欧美国家的历史来看,在完成初级工业化后,经济富裕效应在制造了一大批企业精英成为中产阶层之后,由于企业对技工需求的不可替代性,企业必须拿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与技工人才分享,这种溢出效益造成了财富分配开始向产业工人中具有高技术能的技术工人等过去的社会下层群体扩散,某些过去的边缘性群体中的部分成员,如产业工人中的技术工人,由于掌握了专业技术而成为第一批享受中高收入收益权的社会成员。

今天,中国社会发展开始步入造就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富裕型社会,这其中,创造了社会巨大经济价值的技工人才正用自己的努力改变着自己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形象。尤其是在“技工荒”比较凸显的当下,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有机调动,技工、高级技工成为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香饽饽”,在公共治理所提供制度的激励之下,企业以提供更高的薪水,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更有前景的职业能力塑造来吸引技工和高级技工。地方政府也启动那只“有形之手”,在技工入户、解决保障房、社会保障、孩子入学优惠等方面提供帮助,与企业的动作形成合力。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工资倍增计划,为培育中产阶层富裕社会吹响了“集结号”。在实施工资倍增计划中,向那些掌握了一定劳动技能的技工人才倾斜,推进高级技工率先中产化,是社会进步一个必不可少的进程。因此,政府应当逐步完善“蓝领战略”,丰富产业工人中产化的内容,这对于激励更多的劳动者努力提高劳动技能和水平,培育强大的技工队伍,形成“技工红利”,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能机械地引用仅从理论或技术角度讲没有纰漏的一些市场经济理论,那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忽略了“国情不同”这个关键性要素,将中国的物质文明建设搁置于一个不存在的沙滩之上。

从中国国情出发,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的传统为参照,我们认为在反思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对以下几点加以说明。其一,单纯以 GNP 为指标衡量社会的发展程度,以人均 GDP 来考核人民的生活水平,脱离了中国人多资源相对少的国情,脱离了自古以来形成的量入而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习惯,鼓励所谓的超前消费、信贷消费等,而结果却不能达到策划者的设定目标。其二,过度强调经济效益而从根本上忽视了社会公平,由此导致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后果,人民大众富有的宿愿不能得到满足,逐渐累积起了在不同程度上的不满。其三,虽然正确地认定物质文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也不断强调精神文明的作用,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却没有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致使一些年轻人轻视自己民族流传下来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丢失了建设精神文明的主动权,结果是部分人由此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当前,大众对泛市场经济思潮导致的种种消极现象的广泛存在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强烈不满。同时,学界人士也对这些消极现象产生的原因作出了不同层面的解读,这些都是十分正常的。因为对一些问题,已经可以看到建设性的成果了。面对现实中的那些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继续深刻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因为这样做

学者观点

现在,当资本主义国家再次陷入危机之时,恐怕还是不能指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是穷途末路的论断一定会变成现实,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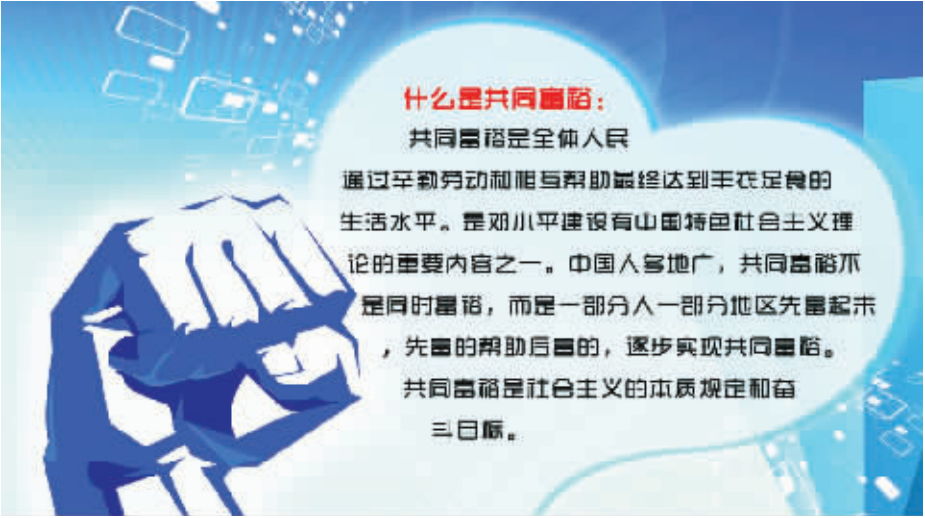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晏智杰

自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如何认识这场危机的根源及其教训,如何反思资本主义,以及如何评价中国这些年发展的道路,成为学界和媒体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灭亡了吗?

有一种观点倾向于认为,这次危机再次宣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他们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造就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持续 1/4 世纪的繁荣,可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冲击和其他各种矛盾的夹击下,资本主义世界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于是新自由主义乘势而起,而这次危机又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可见危机的根源同以往一样,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本身,即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它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没有什么改良和发展的余地,它已是穷途末路,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根除危机。

关于资本主义立即或即将寿终正寝的预言和论断,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之初就出现了,并一直伴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演变和发展,至今不曾终止;每当资本主义遭遇重大危机,这种论断尤其响亮和富于吸引力。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 19 世纪中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方兴未艾之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所发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的著名论断。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资本主义遭遇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的苏联领袖斯大林断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取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不可能拯救资本主义于水火,只能使它陷入更深重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论断的革命和批判精神远高于其实际意义。现在,当资本主义国家再次陷入危机之时,恐怕还是不能指望资本主义生产方



具有更加基础性的意义。除了对于关系改革整体路线上的争议应该进行政治层面上大是大非的辩论外,对于改革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包括一些改革措施是否存在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偏向,或者说某些口号是否正确,要认真地摆事实讲道理。这样严肃认真的做法,可以为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国家作出一些应有的贡献。

对于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推进创新型国家的系统理论,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从全球战略角度看,应当夯实经济基础,突出高技术手段支持下的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强敌在外,国家不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无法实现。要以调整国家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为依据,以营造最充分的就业环境为方向,以实现全民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为阶段性目标,如此,人民才能生

式已是穷途末路的论断一定会变成现实,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这是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危机吗?

另有一种观点倾向于以为,这次危机仍然属于周期性危机,它与以往危机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便可安然度过。可是,我们知道,二战结束并恢复重建之后的 1/4 世纪(1948 年—1973 年),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处于繁荣发展之中,几乎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当然也没有所谓经济周期性循环。后来发生的危机,也主要同 1973 年和 1979 年两次石油危机相关,也不具有什么周期性特点,这说明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传统理论已不能反映战后历史变迁的真实历程。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一种结构性危机,不过它不是前面所说的那种涉及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是涉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合理比例。就是说,虚拟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大大脱离和超出了实体经济所需要和所能容纳的限度,以致引发了危机。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它描绘和反映了这次危机的表现和形式,但它未能揭示其本质。因为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的背后还存在着更深刻的根源,即市场需求和供给这一对基本比例关系的失衡。这种失衡的性质与其说是结构性的,不如说是功能性的,因为这种失衡同市场和国家相关功能是否得到正常发挥紧密相关。

危机根源: 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

我以为,如果说 1929 年—1933 年大危机的根源,如凯恩斯所说,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包括消费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那么,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也不例外,仍然是缘于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功能性危机。只是这次有效需求不足在一段时间内被虚拟的过度需求所掩盖,表现为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催生这种过度膨胀的内在动力是投机资本的无限贪婪,而其形成和扩大的外部条件则是金融当局监管的缺失。这种需求当然不会是实际的或有效的,它所造成的繁荣也不会是真实的和持久的,而必定是虚假的和短暂的。泡沫总是要破裂的,一旦破裂,立即显示出实际的或有效需求



的不足,终于酿成不可避免的危机,甚至从虚拟经济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也就不足为奇了。

既然如此,西方发达国家能否摆脱危机,就看它能否压缩虚拟需求和增加有效需求,从而恢复市场调节和国家调控的正常功能了。人们看到,美国等国家采取的各项反危机措施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一方面,如奥巴马签署“小萧条以来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致力于保护消费者、解决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确保金融业遵循同一套规则,使他们以价格和质量来竞争,而不是技巧和陷阱,从而杜绝滋生虚拟需求的温床;另一方面,通过迄今已经采取的三次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1—3),以支持经济复苏和劳工市场,意在增加和刺激实际的和有效的需求。这一切说明,这次危机的教训不在于其社会的基本结构,而在于其基本经济关系的失衡,而造成这次失衡的罪魁祸首则是华尔街的贪婪和监管者的失误。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后来承认,他曾给以最大信任的参与者自我约束机制没能预防危机的酝酿和暴发。这是对其监管失误责任的最好注解。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从西欧封建制度解体至今已经存在和发展了四个多世纪,其经济体制先后历经了几次历史性转折,先是大约两个世纪的重商主义国家干预主义,随后便是历时二个半世纪之久的经济自由主义,最后便是二战以来近 70 年之久的新国家干预主义,这个干预主义在实践上始于 1933 年开始的美国罗斯福总统施行的“新政”,其理论基础和政策支撑则是凯恩斯主义。上世纪 70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虽使凯恩斯主义遭受重创,并为反对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然而没有过多久,这些旨在拒绝国家干预、倡导完全自由竞争的学说和政策实践即告失败。这次危机从反面再次证明,离开了市场调节与国家宏观调节的有机结合,势必导致经济失衡甚至危机,有理由相信,两者有机结合必将是克服危机、恢复稳定增长的有效体制。总之,资本主义还没有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它还有办法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东升	陈佳贵	
陈恩富	迟福林	戴国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何伟	贺茂之	
洪银兴	胡代光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晓亮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杰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